

“他送我歌剧总谱，我送他民歌伴奏……”

恩师江定仙先生九十诞辰纪念

舒泽池

今年（2002年）是江定仙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我于1960年秋季由一名普通高中毕业生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一直到1966年毕业（我这一届的学制很特殊，是6年），江先生都是作曲系系主任。在当时的体制之下，作为系主任的江定仙先生和作为院长的马思聪先生一样，虽然担任的是“正职”，实际上系和院的权力都在“副职”手里——不说明这一点，现在的年轻人就不会明白，为什么在这漫长的五六年的作曲系学习生活里，作为一个学生而且还短时间担任过系学生会主席的我很少感觉到作为系主任的江先生的存在，事实上很少能够见到他，大概至多每个学期开学的全系大会上，能够见上一面吧。因此，如果不是毕业班时我很幸运的被指派为江先生的主课学生，今天也就没有资格来写这篇怀念文章了。

当时的江定仙先生，只有五十多岁，正值一位作曲家的壮年黄金时期，但是，已经经历了太多的压抑和事变，包括不久前对于电影《早春二月》的批判（江先生为电影写了音乐），无异于雪上加霜。其实，当时的中国，整个都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态。我还记得我的毕业

作品是用当时至为推崇的歌剧《白毛女》的音乐主题写的小提琴协奏曲（现在的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赵薇是这首乐曲的唯一的演奏者）。每次上课都是在江先生的家里，我呈上新写的几页钢琴乐谱，江先生坐在琴凳上亲自弹奏批阅。作为毕业班学生，基本作曲技能已经大体掌握，早已过了“乱”和“脏”的阶段，当时的作曲风格又颇受局限，所以对于和声、织体、发展手法、层次和结构等方面都是顺利通过，只是偶尔发现声部写作上的疵漏，便用红铅笔画个圈。这样，常常不到 20 分钟，一堂课的“正题”便已结束。余下来的时间，就是闲聊了，内容当然毫不涉及窗外的风声、雨声，而是局限于作曲技巧，这在当时，恐怕也不是可以和每一个学生谈论的，而江先生和我讲了不少，还在琴上弹了一些他的作品，包括“为电影写的”片段。有一次兴致特别高时，还特意从书架上取出冼星海《黄河大合唱》在苏联配器的手稿影印本，分析《黄河船夫曲》的前奏，在钢琴上逐个弹奏每个织体，分析其中的线条、节奏、和声和调性。现在想来真是用心良苦，是借着当时被某些学霸神圣化了的冼星海的作品、这一当时唯一可能通向现代音乐技法的狭窄的窗缝，启发学生开拓音乐的视野。其实，如果冼星海活到当时，如果这些手稿能够演奏，恐怕冼星海的命运也不会比江先生更好，恐怕这些手稿也早被扼杀甚至焚烧了！

有时的话题也很随意、很轻松。有一些涉及父辈的友情，有一些提到江先生的经历。他说过五十年代访问匈牙利，见到柯达伊，“他送我

歌剧总谱，我送他民歌伴奏……”。歌剧总谱，应是指柯达伊的歌剧《哈利·扬诺仕》，而民歌伴奏，则是指江先生在“青木关”时期编写的《跑马溜溜的山上》。这段话说的完全是实情，不用说是五十年代，直到当时，江先生作品正式由出版社出版的确实只有民歌伴奏《跑马溜溜的山上》！十年前徐淑民女士远从美国加州拿着私人的美圆回来，才通过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社给江先生的作品编了两本集子，然而还是“非卖品”！所以直到今天，江先生正式出版的作品，仍然只有早已绝版了的民歌伴奏《跑马溜溜的山上》。

文革结束后，我在成都的四川省歌舞团（即后来的四川省歌舞剧院）工作。1979年四川音乐学院请江先生入川讲学，我特意前去拜见（自1966年以后，是第一次见面）。江先生身体和精神都非常好，一见了我就说：“我的讲学你就不要听了，你早就会了。”但是他在川音讲学的几天，我每天都去。从省歌到川音，按成都的标准，路途不近呐！算是对学生生活的一种留念，也是对基本作曲技法的一个梳理。前几天翻出江先生的作品，即以一篇短小的《跑马溜溜的山上》，就可以看出江先生精湛、细致、严谨的作曲功力，这首民歌虽经多次改编，至今无人能右！再看看他的交响诗总谱，前后数十年间所写的钢琴曲，都是如此。对于江先生来说，事无大小，曲无巨细，都是一样的水准，一样的认真，这是何等高贵的品质！

从1996年以后我事实上已经“晋京”，但是生活颠沛不定，当了许

多年“北漂”。所谓“人生一世，白马过隙”，转眼已到花甲。既然不以社会公认的某些价值例如“级别”、“职务”、“职称”、“荣誉”、“报酬”、“住房”之类为重（漠视乃至藐视），有所付出是应当的。因此自认够不上江先生的“得意门生”，遇事不能靠前，自觉的往后站；结果虽然同处首都，反而更少有机会见到先生。乃至先生仙逝的消息，也是事后才得知的！江先生为人一世，我以为以千古不易的“温、良、恭、俭、让”五字相谥，无一不当！江先生留给后人的，正不必化以物质的乐谱、唱片，而在无形而永恒的智慧、精神之中！

（2002年6月，写于北京团结湖）

COPYLEFT 作品

版权所有 · 自由传播